

“十五五”时期青年发展规划： 新环境、新挑战与重点任务

■ 陆杰华 郁亚蔓

[摘要] 青年发展作为我国一项基础性、战略性工程，对于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发展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的青年发展工作正处于“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完成的收官之年，也即将迎来“十五五”规划的谋划之年。站在国家青年发展政策体系和工作机制已经初步形成、国家人口发展发生巨大转变、国家经济形势面临重大挑战，青年发展依旧存在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等新的环境背景下，“十五五”时期的青年发展规划也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挑战，其中重点任务也与以往侧重明显不同。下一阶段的青年发展工作要着力应对经济结构性矛盾、中度老龄化社会、社会个体化趋势、代内分化趋势、网络多元化冲击等一系列全新挑战，加强考量如何培养青年新质人才、纳入全生命周期和代际共融视角衔接新时代人口国情、打通青年社会参与渠道、精准对接青年需求、借助数字浪潮引领青年价值追求、完善多层次的青年社会保障体系等一系列重点任务，实现以青年群体为本，真正促进青年群体的高质量发展，更好发挥新时代青年作为“十五五”时期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力量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 青年发展规划；“十五五”规划；人口结构；数字化时代；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D2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780（2025）01-0005-11

DOI：10.13583/j.cnki.issn1004-3780.2025.01.001

一、引言

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一个民族只有寄望青春、永葆青春，才能兴旺发达^[1]。青年发展是一个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工程，关系到国家的长远发展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一直以来都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青年发展事业，始终把青年发展摆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重要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人口发展新常态到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引领机制与实现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4ARK001）。

作者简介：陆杰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郁亚蔓，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战略位置。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新中国历史上首部青年发展规划《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以下简称《规划》），成为青年发展事业的重要顶层设计和行动纲领，对加快建设中国特色青年发展政策体系和工作机制具有重大意义。随后，在“十四五”规划建设时期，“十四五”规划也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任务与青年发展直接或间接关联，涉及青年发展事务和青年发展工作的众多议题。国家以《规划》作为青年发展领域的纲领性文件，大力推动《规划》与“十四五”规划的有机联动，继续丰富政策成果。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更加强调“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站在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新时代党的青年工作的根本任务，就是要促进青年更好更快发展，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劲持久的主体保障^[2]。

促进青年更好更快发展，首先需要明确把握当代青年发展的现实特征。目前，《规划》实施已接近尾声，“十四五”青年发展工作也已展现阶段性成果，青年发展在“十四五”规划建设时期也呈现出了和以往不同的人口经济社会新特点：一是青年人口规模占比缩小，青年婚恋生育行为转变较大。据全国“七普”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15~34岁青年人口占全国人口比例从2010年的31.92%下降至25.79%。依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2》的预测，至21世纪中叶，我国青年人口比例预计降至不足18%，并自此之后长期保持在18%以下并成为全球青年人口占比最低的国家之一^[3]。青年人口规模占比的缩减反映的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后备军规模缩减与人口红利的消减。与此同时，青年的婚恋生育行为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新变化，在教育投资、照料负担、养育成本、住房成本等诸多因素的叠加影响下，青年群体出现婚育年龄推迟、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普遍降低、离婚和同居现象增多等新的行为表现^[4]，对未来我国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提出了新挑战。

二是青年职业发展更加多样，就业创业竞争压力较大。伴随互联网、数字技术等新一轮的产业升级，平台经济与共享经济的快速发展，灵活就业已成为吸纳就业的重要渠道。据人社部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我国灵活就业从业人员规模已达2亿人左右，而截至2023年底，新型灵活就业求职者中25岁以下人数占比接近50%，30岁以下人数占比接近80%^[5]，新兴青年群体就业形势呈现多元化特征。但是在新业态环境中，高度内卷化、结构性失业等因素造成青年群体就业创业难度加大，我国青年失业率在近几年来一直呈现攀升趋势^[6]。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4年8月份全国城镇不包含在校生的16~24岁劳动力失业率为18.8%，比上月上升1.7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上升并创今年新高。

三是网络文化与青年文化加速交融，青年情感精神需求存在新变化。当代青年是在互联网使用越发频繁、网络媒介愈发兴盛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其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乃至思想文化都受到了互联网的深刻塑造。“十四五”时期，短视频、网络直播等新媒介手段的兴起加速了网络文化塑造青年文化的进程，青年文化表达和价值取向依旧呈现个性化、多元化特征，青年群体自我意识和文化创造活力依旧旺盛，“二次元”“网络热梗”等青年文化现象日新月异。与此同时，面对新时代的社会变迁，青年情感精神需求也呈现出新的转向：一方面，社会内卷、焦虑现象加剧青年内心对未来迷惘的群体性情感症候，从“佛系”到“躺平”

再到“发疯”，近年来这样一种青年释放个体不安情绪、疏解价值困境的文化话语始终在青年群体内存在并广泛传播，当代青年在新的社会现实下面临着新的精神困境^[7]。另一方面，虚拟网络加深了青年社会关系的原子化、碎片化、流动化，线上生活让现实生活“社交降级”，“群体性孤独”同样裹挟着青年群体^[8]。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加速瓦解慢节奏的人际交往关系，青年内心情感精神需求也面临新的矛盾。

目前，新一轮“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已经启动，青年发展在新的环境下同样面临着新的挑战与重点任务。关注“十五五”时期的青年发展规划所面临的新环境、新挑战与重点任务，不仅是结合时代发展，实事求是回应青年发展问题的应有之义，也是指引下一阶段中国的青年发展任务，促进青年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必然举措。

二、“十五五”时期青年发展规划面临的新环境

“十五五”规划作为我国迈向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重要衔接规划，其出台对于指导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间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结合中国当前的国际国内新形势与当下青年群体的新转向，为确保“十五五”青年发展规划能够准确把握青年发展的时代脉搏，充分发挥青年建设力量，青年发展工作面临的新环境必须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重新梳理思路，进行统筹把握。

（一）相关政策环境持续改善，既定阶段目标基本实现

自《规划》实施以来，涉及青年就业、住房、文化、社会保障等诸多领域的政策环境持续改善。截至2022年底，国家层面已出台青年相关政策240余项，覆盖《规划》十大领域，聚焦青年职业教育、青年思想道德、“双减”政策及文化新现象等，有效回应青年就业、文化等生存与发展需求^[9]。例如，2022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颁布并实行《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办法》，当前“新职伤”参保人数已达886万余人次^[10]，新兴领域青年职业保障需求得到回应。青年发展型城市试点工作稳步推进，截至2023年，全国已有超过200个城市党委政府提出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超过全国地市总数的60%^[11]。2023年教育部等部门印发《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年）》，着力关注当下青年心理健康问题。与此同时，在政策落实和监督方面，青年工作联席会议机制趋于机制化、常态化、联动化，青年发展蓝皮书编制以及青年发展数据平台建设，《规划》实施情况监测评估机制完善均为政策制定提供了有效支撑。

总体来看，从出台《规划》到“十四五”时期纵深推进，在近十年的青年发展工作中，我国已经实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青年发展政策体系和工作机制初步形成”的目标，正在稳步迈向“具有中国特色的青年发展政策体系和工作机制更加完善”的总体目标^[9]，未来“十五五”时期的青年发展工作将继续在已有的良好政策环境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让青年发展工作能够更好地把握青年群体内部人口特征差异、城乡差异、地域差异等分化特征，把握时代动向加诸于青年群体的全新变化，精细理解青年群体及其社会需求的发展方向，让政策落实更加有效、灵活、精准。

（二）人口形势变化更加明显，青年高质量发展主题毫不动摇

当前，我国人口发展形势发生重大转折性变化，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与比例同步呈现缩减趋势，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3年，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86481万人，比2022年减少1075万人，60岁及以上人口达2.97亿，占总人口的21.1%，与2010年相比规模增加1.19亿，比例增加7.8个百分点。我国在2011年劳动年龄人口达峰值9.4亿人后始终呈现下降趋势，劳动年龄人口整体老化，人口红利消减的趋势愈发明显。但尽管如此，相关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就业人员合计7.5亿人，其中16~34岁就业青年占比31.6%，就业群体以高校毕业生和中职毕业生为主，近几年城镇新成长的劳动力基本保持在1500万人左右^[12]。青年群体依旧发挥着劳动力生力军的关键作用，依旧是劳动力的重要来源。同时，青年人口受教育年限普遍提升，相比于1978年大学招生人数40.2万人，2020年大学招生人数已经达967.5万人^[13]翻了24倍。虽然处于黄金劳动年龄的青年人口规模正在不断下降，但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规模却在持续上升，我国青年劳动力的素质正在不断提高^[14]。站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的视角下，未来我国需要从“人口大国”向“人才强国”转变，通过提高劳动者的技能水平努力解决岗位需求不匹配的结构矛盾。相应地，未来的青年发展也更加要重视青年人口潜在动力的发挥，把青年高质量发展主题当作毫不动摇的方向。从青年首先发展、青年优先发展再到青年高质量发展，青年发展的关注点逐渐从外部转向内部，从与外相比关注发展时间次序、群体关照次序逐步转向了与内相比注重青年之于其本身层次水平的自我提升，既保证了更广泛的社会认同，也保证了与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相同步^[15]。“十五五”时期，在新质生产力和新型生产关系构建的新变化趋势下，我国劳动力转移、科技进步、人力资本提高等方面将受到巨大的牵引作用^[16]，也必将给青年群体的生存发展与社会参与带来新的机遇。因此，青年发展需要坚定匹配当前高质量发展的阶段特性，加大培育科技创新人才，以更高质量的人力资本提升弥补劳动力人口相对下降的新人口形势。

（三）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旧存在，青年优先发展战略坚定不移

在阶段性成果之外，青年发展工作也依旧面临着政策优惠对象不平衡，政策地域实施不平衡，政策指定人群不充分，政策涉及领域不充分等问题阻碍青年发展的纵深推进。

政策优惠对象不平衡指向政策缺乏面向广泛青年的普惠性，部分省市地区出于对青年优先发展理念的片面认识，将“青年优先发展”中的“青年”仅仅理解为“青年人才”，政策只是瞄向青年中的精英人才，没有扩大到普通青年，部分地区的政策高门槛及申请流程复杂性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政策效能的发挥。政策地域实施不平衡指向不同地区、城乡、新城老城青年之间在教育水平、就业质量、软硬设施支持等方面还存在发展不均衡性。例如，经济发达地区的教育投资规模远大于欠发达地区，且存在显著的累积优势，造成东中西地区教育资源和受教育水平的不平衡^[17]。政策指定人群不充分指向政策缺乏对青年的聚焦，虽然各省市在政策设计的理念层面重视了对青年发展的关注，但是现有政策举措和实施项目更多还是涉及全年龄段群体，聚焦青年急难愁盼问题的专属政策还相对缺乏，政策涉及人群容易停留在“广谱式”层面^[9]。政策涉及领域不充分则指向领域之间与领域内部的政策制定问题。

目前，青年教育、青年就业创业、青少年合法权益维护、青年健康领域的政策措施相对较多，而青年婚育、青年文化、青年社会保障等领域的政策设计则相对落后，政策举措还不明显。在领域内部，也同样存在着发展不均衡现象。

面对不平衡不充分发展新环境，“青年优先发展”战略应当发挥坚定不移的指导作用，进一步推进青年发展工作布局的全面性与均衡性，政策制定也应重新理解“青年优先发展”的深刻内涵。青年优先发展不是某个经济社会发展领域的优先，而是更具有基础性和长远性的发展理念，是一种国家层面的发展战略。青年发展状况决定了国家发展的“上限”和“下限”。诸多研究显示，投资青年发展能够收获显著的社会效益；反之，则可能陷入青年发展缺陷模型所预示的叛逆、破坏乃至社会动荡等问题^[17]。从整体角度看，青年优先发展绝非与其他年龄群体、其它公共事业的零和博弈，而是一种对于社会总体福利的帕累托改进。但同时，青年群体的“社会脆弱性”也必须得到承认和正视。青年时期处在全方位向成人过渡过程中，既有向上向外张力所形成的变革性社会能量，又因自身资源掌控的有限性与全面社会化的不均衡而处于相对弱势。故青年优先发展也离不开对青年发展在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源分配过程中的相对优先位置的强调，以弥补其相对的社会弱势地位，从而保证青年与整个社会的长足发展。

（四）数字化时代问题与思路同步更新，青年主体地位始终贯穿发展主线

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当下，当代青年群体也在生活方式、消费行为、社会心态等诸多领域产生了不同于以往的深刻变革，而我国在青年发展上的工作思路和侧重点也将作出相应改变。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生产方式和产业结构将不断调整，社会对新生产要素的释放也会不断加快。非体力劳动结构持续且日益精细的分化趋势，将与新业态对专业技术人员的增长需求保持一致^[18]。因此，青年群体无不面对着更广泛灵活的职业选择与多样化的社会流动机会。另一方面，新时代的人才培养工作已经与技术革命的步伐紧密结合。相较于过去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应用方式，人工智能已经开始对后工业社会的市场需求、产业格局和价值体系产生了广泛影响，并深刻塑造着未来青年群体素质提升的关键导向，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的数实融合加速浪潮也对未来社会所需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要求。此外，当代青年的社会化过程同时也是一场数字化过程，数字手段已经广泛融入青年群体的社会参与。如学者对数字乡村建设的研究发现，外出村民尤其是外出的青年村民借助数字化平台能够以更低的成本远程参与乡村治理^[19]，不少青年通过短视频等方式创新融入当地特色文化宣传等等，未来数字技术也可能进一步激活青年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主动担当精神的发挥。因此，未来“十五五”时期的青年工作更应该选择适配数字化时代发展导向的新思路，以实现新时代青年群体的共建共享为落脚点，把青年主体地位贯彻发展主线，积极把握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青年“三创”基地建设等契机，通过一系列普惠政策，主动服务广大青年，将青年对自我成长的追求引向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领域，缓解数字化带来劳动力供需结构性矛盾、后工业社会的竞争加剧、社会流动相对弱化等问题。同时，通过分层分类施策，确定不同的工作目标、有效载体以及重点工作，不断提高政策服务青年群体的精准度。

三、“十五五”时期青年发展规划需要破解的新挑战

(一) 经济发展新常态和结构性矛盾亟待重视

青年发展理论认为,社会发展决定青年发展,青年发展受限于社会发展水平,不可能超越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同样地,社会问题决定和建构青年问题,青年问题是社会问题最直接和最明显的外在表征,青年问题的减缓和解决有赖于相关社会问题的减缓和解决。青年问题一般不会独立于社会问题而单独存在和发展,往往有可能诱发和加剧社会问题,容易呈现出青年问题与社会问题同构互促的典型特征^[20]。当前,我国正在面临从规模速度型经济向质量效率型经济转变,整体经济扩张速度放缓的发展新常态,其中结构性矛盾突出已经成为一个较为严峻的社会问题,同时也造成了相关联的青年发展问题,其中青年就业受到较大影响^[21]。一方面,当新技术和新产业进行快速更新迭代之时,青年劳动力群体的接收信息和学习过程相比之下总是呈现一定的滞后性,技能不匹配的情况加剧了失业率的上升,青年学习技能往往也需要一定的时间积累,短时间内摩擦性失业问题遭到放大。另一方面,职业教育发展开始无法满足或者很难跟上中高端产业对于技能型人才水平越来越高的需求,高等教育专业方向与加速变革的产业结构脱节,而这也进一步影响青年顺利匹配工作岗位。但与此同时,与较高青年失业率同时存在的是日益严重的招工难。诸如青年就业观念的转变,“慢就业”“间隔年”的兴起、高校扩招导致的青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延缓、一些新兴职业的污名化等因素都造成了不少企业“招工难”的现象存在。青年劳动者的就业倾向、教育技能与产业结构三者间的矛盾与错配,导致三大产业均存在十分突出的“求职难”与“招工难”结构性两难问题^[2]。错配与失配不仅影响着青年就业,同样也牵涉着青年发展的身心健康,学业和职业焦虑普遍发生在青年群体之上^[18]。同时算法逻辑在企业管理体制中的引进也将更激烈的竞争压力以“KPI”等量化方式加重劳动者的负担,青年的奋斗热情逐渐被异化为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内耗,危害青年劳动者的身心健康。因此,思考如何应对由经济发展新常态决定的青年就业的供需结构性矛盾问题,保障青年劳动者的积极心态和奋斗活力,促进青年的全方面高质量发展,将是下一阶段青年发展规划首先要面对的重大挑战。

(二) 人口变化新趋势与规划定位衔接亟待加强

当前,我国生育水平持续走低,总人口增速明显放缓,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性特征^[22]。同样地,站在青年发展理论视角下看,我国老龄化的人口重大变迁同样给青年群体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挑战。其一,青年养老与备老问题目前正愈发受到关注。在少子化与老龄化的双重压力下,青年群体的抚养比正在上升,青年赡养与育儿的压力正在不断增大。同时,伴随家庭户均人口缩减与家庭功能的明显弱化,当代青年逐渐从“养儿防老”的养老观念转变到“多元自主”养老^[23],青年群体逐渐开始采取提前备老、养老规划等相关行为,在“养老”与“养小”之外加入了对自己未来晚年生活较高预期的“养己”需求,同时也需要在照养责任之外平衡工作-生活的压力^[24]。其二,在多元文化和个性自由思潮的影响下,传统婚育观念和道德伦理约束逐渐被消解,经营婚姻和养育子女越来越被看作成一种经济、时间和情绪上的负担^[25],青年群体的生育意愿呈现下降趋势。其三,区域内人口增减分化趋势明显,青年流动人口的规模也持续增大,部分一、

二线城市中心城区也在面临老年人口高度集聚与“大城市病”叠加的新问题，这样可能会导致大城市青年压力进一步激增，地区青年发展不平衡等诸多问题加剧^[22]。面对老龄化社会的新形态与随之而来的青年发展问题，未来“十五五”时期的青年发展规划必须加强规划在定位上衔接我国加速老龄化的新国情，需要站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视野下重新梳理青年发展关键议题，考量青年养老备孕等新变化与相关应对举措。

（三）青年个体化趋势与青年时代使命担当之鸿沟亟待破解

伴随社会体制改革和现代技术的兴起，生产的个体化和家庭生活的个体化趋势日益显著，并成为影响青年人际关系和价值观念的重要变量。青年群体通过网络创造出新的人际关系嵌入渠道，拥有独立的网络社交圈，在形式上逐渐脱嵌于血缘关系、原生家庭等。网络中的陌生人社会也使得人人都是交往圈的中心，由此形成了不同于传统家庭结构的去权威化和扁平化的人际结构。然而，青年个体化趋势的背后也容易造成个体道德信仰的冷漠化^[26]、家庭或代际责任的淡然、社会交往与政治参与冷漠等不良问题出现，从而影响青年积极正向力量的充分发挥和青年时代使命的充分担当。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需要发挥青年发展对于社会和国家发展的能动作用，激发起青年担当时代使命的关键主导力量。除此之外，老龄化社会的新形态也比以往更加需要全社会在亲密的社会交往与共同的历史使命下，形成真正而持久的不同队列命运共同体，更加需要突出青年与社会的共同体意识^[27]。青年发展规划也亟待加深对青年公共性议题的进一步思考，对新时代下发挥青年使命担当给出新指导。

（四）代内分化趋势与群体差异化需求亟待协调

新时代青年群体成长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共同代际体验和受到相同重大历史事件影响塑造了新时代青年群体独特的集体特征和强烈的代际认同^[28]。但是代际共性不代表可以突破社会结构的制约，代际认同也无法消解代内的社会经济差异；相反，受到城乡二元结构、教育分层、阶层分化、体制分割等不同成长环境的持久性影响，当代青年群体内部依旧存在着代内分化的趋势^[29]。并且，新时代的新兴经济领域的产生也使当代的青年代际群体内部呈现了新的分化趋势，比如数字蓝领（如外卖员）与网络文化青年（如网络媒体从业者）的分化，前者多来自农村或城镇的低文化水平青年，困在算法之中疲于奔命，后者的青年从业者则多有较高文化水平，受兴趣驱动也致力于文化创新。此外，在互联网数字时代巨大的信息浪潮与多元文化裹挟的环境中，青年的圈层化现象也逐渐明显^[9]。因此，呈现分化的不同青年群体也对其自身发展有着差异化需求。那么新时代的青年发展规划编制工作也必须做到针对青年群体的精确识别和类别归属，而非机械、笼统、粗糙地将其视为一个集合体。针对群像特征的笼统举措往往已经不能满足现实问题的解决。比如，在破解青年低生育现象的难题时，政策在制定时应该考虑群体本身具有更为细致分类，“不敢生、不想生、不能生”每一类别群体的生育动力和阻力均存在差异。细化辨识施策对象后施以针对性干预，才能够达成在满足政策接收者需求的同时提高政策效能这一双赢目标。然而精确识别工作往往也意味着需要学界研究和政策施策等相关领域投入更大的成本，目前诸多领域还依旧处于探索阶段。

（五）网络多元文化与青年群体主流价值观亟待重构

价值观是个体基于一定的思维观念而作出的认知、理解、判断或抉择，是人们认知事物、

判断是非的标准，它直接影响和决定一个人的理想信念、生活目标和追求方向的性质。青年群体正是在一定的价值导向下，构建出独立的客观事物评判体系，自主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30]。但是，面对当今各种思潮相互激荡、信息加速生产传播以及社会急剧变迁中存在的各种现实问题，具有较强可塑性和未定性的青年思想心理非常容易受到影响。因为经验不足和认知局限，青年心理难免产生“精神阵痛”，表现出带有时代特征和个人印记相叠加的彷徨和无助。在实际生活中面对“失权”“弱权”困境^[30]，面对个人努力与个人向上流动机会失衡矛盾的青年往往有着较大的情感宣泄需求。网络媒介、资本运作等手段借此契机衍生出“躺平”“摆烂”等亚文化，对这些青年产生了极强的吸引力。部分青年沉溺于此种负面情绪的侵蚀之中选择走向虚无主义的泥潭，逐渐丧失自我价值，与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背道而驰。同时数字手段的愈发发达往往还会进一步促成一场亚文化的话语盛宴，将亚文化的集体狂欢弥散在青年群体之中，其既无法解决现实问题还会使更多心智不坚定的青年发生局部性的思想扭曲和道德滑坡危机^[30]。面对当代部分青年的价值虚无与多元文化冲击，符合数字化新形势和“互联网原住民”一代青年群体的风格实践的主流社会文化亟待重构。这也需要我们进一步理解亚文化背后青年的思想困顿，通过科学的舆论引导、议题设置、思想道德教育分众化实施等机制引领青年自觉树立正确的思想价值观念。

四、“十五五”时期青年发展规划的重点任务

针对“十五五”时期青年发展规划可能面临的新环境与新挑战，“十五五”时期的青年发展规划工作依旧需要明确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以党管青年为重要原则，同时按照青年发展工作的完成情况和新的人口经济社会新特征确定下一阶段的规划定位和总体目标。在具体内容上，也需要突出体现对重点任务的规划部署，更加精准切实地推动青年的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进程。

（一）面向新质生产力，培养青年新质人才

着眼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如何培养能够适应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青年新质人才，破解在经济转型升级背景下青年劳动力市场错配问题将成为下一阶段青年发展规划在青年就业、青年教育等领域关注的重点任务。一方面，需要从青年劳动力供给端着手，探索衔接联动新兴技术和产业发展要求的全生命周期青年人才教育、人才发展和就业服务体制，深入分析当代青年劳动者就业的倾向、观念和需求变化，探讨如何缩小和弥补就业期望与就业环境之间的现实差距，从而提高青年就业质量，增强青年劳动者的就业和工作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发挥青年的人才红利和创新活力。另一方面，也可以从市场的企业需求方着手，积极探索如何完善政策支持以有效破除民营经济发展困局，加大力度发展扶持一批耐心资本、良心企业，聚焦重点环节分领域推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持续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全面提升经济发展韧性和增长活力，保障高质量岗位的长期稳定供给，引导青年自主增强自身素质，提升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同时，继续健全针对新业态下的新兴青年就业群体的劳动保障工作，从法律法规完善等角度兜牢就业底线，缓

解数字化时代下就业群体面对的高风险和高不确定性，稳固就业市场信心。

（二）重新思考老龄化社会下的青年发展，融入全生命周期和代际共融视角

新时代的青年发展注定也是老龄化社会新国情下的青年发展。面对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人口新特征，未来的青年发展规划亟需思考如何在老龄化社会背景下发挥青年群体的独特力量和优势作用。例如，青年养老观念的改变将可能同时拓宽银发经济的生产与消费对象，提升围绕银发经济的相关产品和服务的全渠道经济社会活动，实现从人口红利到长寿红利的新经济形态转型。对此，未来的政策导向可以引导青年更加关注未来的养老规划，以效用最大化的理性原则处理不同年龄阶段的储蓄和收入^[23]。同时在青年普遍婚育意愿不强的大背景下，原先《规划》中的“青年婚恋”议题应该在人口老龄化新常态的背景下转为“青年婚恋生育”议题，未来的青年发展政策迫切需要分析当代青年婚育观念及行为形成的经济、文化、社会、政策等多重动因，精准施策，解决青年群体心头所虑，加强政策评估和人口预测，完善青年群体的社会保障和生育支持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进一步健全青年租住房支持政策体系，加强多样化多模式的高品质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同时，政策规划也应该融入全生命周期视角和代际共融视角，前者坚持以全生命周期理念贯穿青年发展全过程，促进青年发展阶段性特征与全过程性路径的有机结合，后者则将多代际优势资源融入青年发展行动，促进全年龄段人口的共同参与和协同发展，充分开发与盘活长寿红利，开辟青年发展的多样化路径及渠道，塑造新时代青年在实现积极老龄化中的主体优势和代际价值^[2]。新一轮青年发展规划编制工作可以将强化青年家庭养老责任，赓续新时代孝道文化等加入青年文化工作，将代际共融理念融入具体的工作指导，健全家庭建设，探索缓解青年家庭养老照顾负担，促进代际互助与代际共同发展的经验方案。

（三）打通双向发力渠道，坚持实现全体青年共建共享的根本目标

新发展阶段，青年高质量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依旧是实现全体青年的共建共享。当前，我国的青年发展工作已经在诸多方面为青年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但是对于加强青年社会参与的相关政策制定和实施情况还亟待完善。对此，未来的青年发展工作也应继续加强对青年的价值引领，把握好青年发展的正确方向，给予青年更广阔的社会参与机会，优化青年社会参与的相关政策环境，确保所有青年群体平等参与，不断增强青年的存在感、获得感，不应使部分青年悲观地在结构性压力下沉溺于虚拟的网络世界自暴自弃，也不应使部分青年在个体化、原子化、碎片化的趋势下迷失道德信仰。政策上可以拓宽青年参与青年发展工作的渠道，坚持以群众工作的基本逻辑动员更多青年来积极参与到规划的实施工作之中，例如进一步提升符合青年特点的协商民主实践活动的经验做法，建设“更友好”但也“更有为”的青年发展型城市。

（四）精准对接青年需求，建立动态化的监测与调适机制

促进青年发展是一项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的工作。“十五五”时期青年发展工作应该对青年群体的相关政策进行更细化的分类工作，从而提高政策服务青年需求的精准性和匹配性，始终坚持问题导向，注重发现青年发展各领域面临的新矛盾、新问题。青年发展规划工作要重视不同青年群体之间、青年群体与其他群体之间的关系，通过补齐短板挖掘发展潜力，补足发展后劲。同时也要重视青年发展政策之间的协调，充分发挥好青年工作联席会议

机制的作用,通过政策协同达到政策效益的最大化^[31]。数字化时代的当下各种新现象的更迭速度都在不断加快,社会变革的速度加快同样也意味着青年群体所面对的环境与问题的更新速度也在不断加快。面对较之过去更加具有不确定性和变动性的青年发展环境和人口变动趋势,青年发展政策也要尽快建立好一套完整完善的动态化监测与调适机制,及时应对动态环境呈现出的新特征和新趋势,及时评估和检验政策落实效果,借鉴国外指标体系经验,在充分监测评估的基础上更好地修订与调整政策,真正实现青年高质量发展。

(五) 解读当代青年社会心态与观念,借助融媒手段坚守主流价值阵地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在物质生活相对丰裕的时代,正确认识、理解和引导网络社会下的青年社会心态和文化观念,是未来青年发展值得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2]。一方面,新时代青年文化工作急需关注形成青年社会心态和文化观念背后的底层逻辑,针对现象回应青年需要。网络青年亚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的价值冲突的根源性因素归根结底还是利益问题。青年是对社会变迁感受最为直接的群体,青年亚文化投射出青年对利益诉求的期待,同时也反映出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32]。因此,价值引领工作首先就是要理解青年亚文化背后反映的社会现实问题,精准把握并解决青年在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的实际利益难题,才能化解青年因社会转型产生的精神症候,有效培育青年积极健康的社会心态。另一方面,青年文化宣传引领工作也可以进一步以社交媒体为渠道拓展舆论新阵地,以主流媒体与青年群体建立更紧密的联系,提高舆论传播的有效性和影响。通过积极正向的议题设置、充分探讨青年生活关切、主动融入青年世代流行的“话语圈”等手段,借助平台优势,与青年展开对话,对青年进行心理疏导工作,引导青年群体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增强其社会责任感和归属感。

(六) 完善青年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打造青年发展坚强后盾

在原先的《规划》中,青年社会保障领域的发展举措只提出了“加强对残疾青年的关心关爱和扶持保障”和“加强青年救助工作”两点,在顶层设计路线上,青年社会保障工作缺乏更多层面明确的相关指标。当前我国青年社会保障发展还面临着发展性理念不强、系统性思考不够、专属性定位不明显、青年社保认知度不高、重点人群和领域关注不多等突出问题。面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和青年人口结构调整、青年流动性加速以及新兴行业快速发展、低收入群体基数依旧较大等新形势新任务,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扩大失业、工伤、生育保险覆盖面”“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新一轮青年发展规划工作应着眼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青年社会保障政策体系,进一步探究青年群体如何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取得制度性突破,并从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优抚、补充性社会保障等角度系统构建起覆盖全体青年、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2-05-10(1).
- [2] 陆杰华,孙杨.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视域下当代中国婚育观念及新型婚育文化构建[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 2024 (3): 90-103.

- [3] UNITED NATIONS.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22 [EB/OL]. [2024-02-29]. https://population.un.org/wpp/Publications/Files/WPP2022_Data_Sources.pdf.
- [4] 陆杰华, 冯雨欣. 青年发展视角下新时代青年人口的性别差异探究 [J]. 中国青年社会科学, 2024 (1): 23-33.
- [5] 2023 中国新型灵活就业报告 [EB/OL]. (2024-01-17) [2024-11-30]. <https://www.hrssit.cn/info/3146.html>.
- [6] 张青松, 代伟. 青年失业率攀升的形成机制与政策应对 [J]. 青年探索, 2024 (4): 82-92.
- [7] 叶萌. “发疯文学”: 当代青年话语中的仪式抵抗 [J]. 青少年研究与实践, 2024 (11): 1-9.
- [8] 王昕迪, 胡鹏辉. 搭子社交: 当代社会青年新型社交趋势与形成逻辑 [J]. 中国青年研究, 2023 (8): 90-95.
- [9] 郭元凯, 邓希泉, 田思钰. 《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 (2016-2025 年)》执行效果评价研究——基于 2022 年度实施情况的系统考察 [J]. 新生代, 2024 (1): 4-12.
- [10] 进展如何, 效果怎样? ——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情况调查 [EB/OL]. (2024-08-16) [2024-11-30]. https://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dongtaixinwen/buneciyaowen/rsxw/202408/t20240816_524067.html.
- [11] 聚焦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 青年在城市更有力 [N]. 中国青年报, 2023-10-23(1).
- [12] 后疫情时代我国青年就业状况分析 [EB/OL]. (2021-08-03) [2024-11-30]. <https://www.hrssit.cn/info/2405.html>.
- [13] 张翼. 中国青年人口的新特征——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J]. 青年探索, 2022 (5): 5-16.
- [14] 陆杰华, 程子航, 陈炫齐. 人口高质量发展进程中青年发展型社会的理论探究 [J]. 青年探索, 2024 (3): 5-14.
- [15] 张良驯. “十四五”时期青年高质量发展研究 [J]. 青年探索, 2021 (1): 15-26.
- [16] 周丽, 范建华. 形塑信任: 网络电商直播的场景框架与情感逻辑 [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 (2): 142-147.
- [17] 刘程. 新时期青年优先发展理论与公共政策研究 [J]. 青年发展论坛, 2024 (1): 28-38.
- [18] 房宁, 张权. 新时代青年工作的挑战与机遇 [J]. 青年探索, 2023 (5): 16-24.
- [19] 张茂元, 黄芷璇, 王飞飞. 青年流动中的乡村治理危机及其数字化应对 [J]. 青年探索, 2022 (5): 17-26.
- [20] 邓希泉. 青年发展理论的基本问题研究 [J]. 中国青年社会科学, 2018 (1): 44-54.
- [21] 徐明, 陈斯洁, 聂云蕊. 我国青年就业研究的核心议题、演变与展望 [J]. 人口与经济, 2024 (5): 92-107.
- [22] 陆杰华, 林嘉琪. 中国人口新国情的特征、影响及应对方略——基于“七普”数据分析 [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21 (3): 57-67.
- [23] 陆杰华. 银发经济视角下青年养老观念的新变化 [J]. 人民论坛, 2024 (10): 88-91.
- [24] 杨守建. 从“中间”到“中坚”: “中坚青年”的角色与压力 [J]. 中国青年研究, 2021 (11): 4.
- [25] 宋健, 刘诗雯, 唐田荣. 低生育率背景下的中国婚育文化观察 [J]. 人口研究, 2024 (5): 17-30.
- [26] 卜建华, 黄一. 网络社会青年道德信仰冷漠化风险及应对策略 [J]. 江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0 (2): 57-67+126.
- [27] 朱荟. 老龄社会的新青年研究: 概念隐喻、议题重构与公共叙事 [J]. 中国青年研究, 2022 (10): 37-44+12.
- [28] KARL MANNHEIM. The Problem of Generations [M] // PAUL KECSKEMETI. Essays o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Collected Works Volume 5, Routledge, 1952: 276-322.
- [29] 李春玲. 代际认同与代内分化: 当代中国青年的多样性 [J]. 文化纵横, 2022 (2): 29-37.
- [30] 湛韵灵, 邹升平. 网络青年亚文化的特征及引领路径探析 [J]. 南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1 (1): 124-130.
- [31] 风笑天, 廉思, 邓希泉, 等.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发展与青年政策 (笔谈) [J]. 青年探索, 2022 (3): 5-19.
- [32] 罗红杰, 何彩莉, 康蕙泽. 网络青年亚文化的表意实践及引领路径 [J]. 青年学报, 2024 (4): 98-105.

责任编辑: 罗飞宁